

## 余一鸣的拷问

文/吴俊

相比于少年得志的青春写手,余一鸣算是个大器晚成的作家。而且他走的是一条更接近于传统的写作路子。他在新世纪的写作接续了新时期的文学血脉;尤其是他的批判立场承袭了更为深厚的文学脉传,成为一种自觉担当社会使命的思想性写作;而他的“保守”写实手法,又最能显示他挑战文学难度的自信。

余氏小说多有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传统政治底色已经相当模糊,代之而起的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社会的表达空间。他纠结的不再是人间关系中关涉到重大现实政治矛盾的冲突,而主要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经济生活对于当代社会和人性追求的颠覆性冲击与重塑,以及由这种冲击和重塑产生的种种当下性困境。直面困境的写作,赋予了余一鸣小说的现实感。——我们几乎不能把握自身的现实依附究竟何在,即一种可谓丧失了理性自觉的迷失感,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的普遍现实。余一鸣小说中的人物各有不同,但在其行为动机中都可以看到利欲的冲动和追逐如何影响了人性和道德的表达,道德如何深陷在困境的泥淖之中,以及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深陷其中的一种救赎无望的存在困境。没有一个人是经得起拷问的,怎么办呢?这是余一鸣小说所呈现并追问的现实问题。

以《淘金》集为例,其中的《入流》主人公都是外出打工的农民。社会的整体转型变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改变了原先的人际亲缘和社会关系,而且更加彻底地改变了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甚至是在最彻底的意义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人性。这意味着当下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已使人难以准确定义我们的社会身份——这就在客观上使得道德成为一种有时需要悬置的模糊、暧昧的存在。重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成为重建社会道德的过程。但在这过程中,首先经历的是道德的崩塌或弃置。这正是余一鸣小说所直面的当下困境。很难用既定的道德标准来评判小说中的角色。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再需要善恶的区分,而是因为善恶判断的模糊和暧昧,已使得道德意识趋于瓦解,道德成为一种不需要顾及和思考的问题——这却是当下社会和人心的可怕性所在。最终使得作恶才是成功的投名状成为社会的约定俗成或潜规则。如果利欲的追逐和财富的增长需要人

性付出这种代价,那么所谓的社会进步又将如何体现呢?我们对于财富的不可遏制的追逐,如何才能体现出文明和人性进步的意义呢?这一切现在都找不到答案。

《不二》更加典型。主要人物都是建筑工程或建材的包工头。他们多是有着多种思考和人生智慧的时代弄潮儿。但就是这种能够体现社会发展的角色,却在基本的道德考验面前陷入不可收拾的溃败。作家显然已看透了这个时代的人性真相,他笔下的主人公只能将最宝贵的情感和道德价值弃之不顾,在亲手做成的围墙中囚禁自己。所谓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更大的悲剧是这种人性基本良知的溃败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人性的堕落使得人伦的禁忌在一瞬间便可轻易地跨过去。余一鸣的小说常在这些地方使我感到恐惧,他逼使我必须直面自己所处的困境,明白自己只是个在现实面前闭上眼睛假装沉睡的人。

现实的利欲在虚拟的世界里同样可满足另类的想象,最后导致罪恶。《愤怒的小鸟》是一篇网络题材的中篇小说,主人公多是初中生。这群未成年人,却是网络世界里的强人,他们自成江湖,除了技术,也靠诡计。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的世界其实已经分裂成两个互相交叉却又互相隔绝的空间,现实生活网络规则看来更像是虚拟世界。并非网络世界与实际生活合二为一了,而是两者的边界都变得模糊了。于是,在网上可杀人如麻的快感,轻松地入侵到了现实生活中,由此改变了人性的基本价值观。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在将花季少女意外致死之后,三个少年还能如此无动于衷地冷血。网络少年的杀人故事看起来有些极端,但在网络生活成为常态的当下,现实发生的一切只会更加残酷。这篇小说的挑战性并不亚于《淘金》三部曲,而且写得更加从容真切。——因为这篇作品,余一鸣没有任何悬念地荣获了最新一届紫金山文学奖。这也是他二度折桂江苏的最高文学奖。这应该意味着在高原生态的江苏文学格局中,余一鸣已经真正崛起了。事实上,他也已经是那个有着全国影响力的当代作家。■

## 话说南京民国老大学

文/刘云

说到民国时期的大学,无论是师资队伍、学科建设,还是培养人才,南京的前身中央大学,都要远远超过清华、北大、西南联大。在1948年由普林斯顿大学评出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央大学位居亚洲第一,并挤入世界大学前50名。

当然,中央大学的辉煌离不开民国南京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但这方面的影响只是外在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女大等南京高校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最主要还在于内因。首先便是校长的功劳。校长是一所大学的“领头羊”,决定着学校的发展方向 and 道路,可以说“校长强,则学校强;校长衰,则学校衰”。以中央大学为例,如果没有“东南大学之父”郭秉文的奠基,没有罗家伦十年的“安定、充实、发展”,没有吴有训的提升,就绝不会有中央大学的牛气。掌学校二十余年的陈裕光、吴贻芳对金陵大学、金陵女大的贡献更是居功至伟,可以说,完全是他们一手把学校“养大”的。其次,在于师资的优良。诚如“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师资乃是学校发展的命脉。中央大学之所以能成为全国最高学府,最主要就在于它的师资最多最为优秀,如郭秉文曾将“中国科学社”的核心成员都请到

学校,中央大学理学院仅1933年就聘了10余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再者,学风的影响对一所高校也至关重要,可以称得上是学校的“灵魂”,如中央大学的“诚朴雄伟”校风、金陵女大“厚生”精神、晓庄师范学院“生活教育”理论都是这些学校取得独特成就的重要原因。最后,不得不提的还有“教育独立”,即遵循教育规律办学,尽量减少政治干预,教授治校,学生治学。

遗憾的是南京民国大学的辉煌成就却多被“忽视”,国内外相关研究并不太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近日出版的《先生归来——南京民国老大学的那些人和事》试图填补这一空白,述评了郭秉文、罗家伦、吴有训、陈裕光、吴贻芳、陶行知等十位南京民国大学校长,主要介绍其教育经历、成就、思想,试图挖掘他们如何办好大学,以供今人借鉴。此外,师生是学校的主体,该书也“刻画”了十位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高校各具特点的师生,以此反映南京民国大学的整体风采。该书还试图窥探民国时期大学的总体风貌,在书中打了许多“补丁”。“作者以独具匠心的视角、具体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细腻的笔触,通过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使那段时期那些大学的历史活生生地并



跌宕起伏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避免了传统校史著述给人的那种平淡无奇、一览无余的感觉,从而增强了著作的可读性。”

虽然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女大都已成为历史云烟,但它们的贡献无法抹掉,其教育价值更是永垂不朽,值得我们走近、了解、学习,如北大陈平原教授所言:“我相信中国的大学不可能单靠单纯的横向移植,是否理解并尊重百年来中国大学的风雨历程,将是成败关键。”如能配备杰出校长和优秀师资,拥有良好学风,遵循教育规律,去行政化,我们今日的大学再创辉煌也并非难事。■

## 言说的痛

文/朱大可

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提出的“随笔主义”,“一种支配生活、思考和书写方式的混合疗法,是针对战争状态下不确定性的生命策略。产自二战时期的哲学,延续到了转型中国,它要营造一种自由、实验和隐喻的写作空间。但这种随笔始终处于文学的边缘地带,被“擅长小说和散文”的主流作家所轻蔑。

蒋蓝是大批四川先锋诗人分化后的“剩余价值”。他是“非非主义”的第二代传人,多年来保持了跟诗歌相关的书写,成为盆地写作的晚期代表,在他身上,延续了八十年代川籍诗人的各种特点:非非式的语词营造、钟鸣式的知识考古以及以世俗的方式在世,跟日常生活保持良好的关系。

我跟“非非派”的诗人,有着年份久远的交往。1986年非非崛起,蓝马草拟的取消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的宏大宣言,一度引起我们的强烈关注。1989年在长春《作家》杂志社颁奖,我结识自称有气功附体的杨黎,领教了“非非派”的天真;在扬州,我又认识了何小竹等人;唯独跟蒋蓝的见面,一直推迟到2007年,差不多晚了20年。在成都,我们在一家欧式茶室里喝茶,一边听着川音女学生唱着普契尼的歌剧。颤动的性感嗓音,像猫科动物的眼睛一样闪烁不定,令人想起蒋蓝的书写风格。

我第一次阅读蒋蓝,正是他关于猫科动物的叙事。他对于动物灵性的通达,以及关于猫的性感躯体的描述,令我感到吃惊,因为这完全超越了非非主义的逻辑防线。

而在这本叫做《媚骨之书》的

书里,蒋蓝打开了关于身体神话的改写工程。我们不仅可以读到器官功能的陈列、解读和揭示,还能够窥见器官在酷刑里所放射出的诡异光芒。

大量的知识考古、狂热的历史想象、复杂的个人经验、丰富的诗歌意象以及批评家式的高谈阔论,这五种元素的任意组合,形成了一种狂飙式的语势。这跟周作人先生倡导的“娓语”式随笔截然不同。它不是把人引向灯下的闲话,而是令人起坐,转向更为亢奋的日神状态。蒋蓝说,“我像一只飞蛾,在越来越危险地靠近火苗”,这与其说是一种自我警告,不如说是一种对火焰叙事的自我赞赏。

蒋蓝随笔的特征在于铺叙。他放任恣肆的风格,酷似司马相如,俨然是后者的直系后裔。这是一种仅属于古蜀国的历史性聒噪。从一个细小的词根起始,语词及其意义开始火舌般闪烁,向四处燃烧和蔓延,展开迅速而大量的自我繁殖,最后拓展为一部规模可观的随笔。蒋蓝很本土地发挥了蜀人的书写天性,令这部知识考古著述变得趣味盎然起来。

在本书中,蒋蓝表达了对“文学党人”以及正统散文家的反蔑视。这是民间先锋派的一贯立场。是的,这是“随笔”向“散文”宣战的时刻。在杨朔、秦牧、刘白羽和余秋雨的哥德式散文面前,这样的随笔是离经叛道的。它把媚骨留给散文,而把利爪留给了自己。

“绑在十字木桩上的石打开,像一头摊开的蜘蛛。血在地面编织着狰狞的构图,他的双眼被头



皮覆盖着。残肢就像神话人物刑天一样,身体上突然睁开了无数双眼睛。”

这是残酷美学的一鳞半爪。在一种历史性的暴力景观面前,破裂的伤口像眼睛一样张开,露出愤怒的表情。但这痛苦而不谐的表情,不仅属于晚清,并隐喻着某个“无脑化幸福”的时代——丧失了对于历史疼痛的最基本的感知力。

为了修复这种文化痛觉,蒋蓝的随笔犹如刀子,在历史和文化的肌骨上精细地刮着,制造出大量事实碎片。它要撕开那些被历史织锦包藏起来的血腥真相。这些真相关乎种族和人类的命运,本应离我们很近,但却因遭到口红散文家的遮蔽,而离我们很远。现在,越过那些被揭发的媚骨,我们即将面对历史残肢的伤口,并为此感到言说的剧痛。而正是在这电击式的剧痛疗法中,我们才能修复关于历史的良知。■

